

## 论 文 提 要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力量在南方遭到重大损失,长江流域及南方诸省的地方组织几乎被反动势力摧毁殆尽。遵义会议后,主力红军和党中央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重心转移到大西北。其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实行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根本性转变,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体方针政策,并逐步将党的力量从西北一隅扩展到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广大国统区,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抗战初期,中共力量在南方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发展。党在南方13个省重建起省委、省工委、省级特委及其下属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10万人左右,组建新四军并东进抗日,部分地准备与发动了江淮河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掀起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救亡运动高潮,为迎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其主要历史经验:一是牢牢地把握时局,自觉地实行政治策略路线的总体转变,为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建党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为党的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三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在抗日救亡洪流中壮大党的力量;四是根据战争状况,针对南方不同地区的特点而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以壮大党的力量。

# 论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力量 在南方的历史性大发展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夏钢 陈芳国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史称抗日战争初期。在这短短的15个月中，中国共产党从陕北苏区走向全国，从大西北走向南方，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迅速壮大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大党。

此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自觉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路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的彻底转变，在军事上自觉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场向抗日民族解放战场的军事战略的彻底转变，在组织上迅速地改变了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地方党组织在十年内战中几乎被摧毁殆尽的极端困难局面。党先后在苏、浙、皖、鄂、豫、湘、赣、云、贵、川、桂、粤、闽13个省，重新组建起省委、省工委、省级特委及其下属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10万人左右，迅速地将在南方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东进抗日，创建了苏南、皖南两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和皖西抗日游击区，使中共在南方的抗战劲旅——新四军由1万人枪扩大到2.5万人枪，并且部分地准备与发动了江淮河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地在国统区掀起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广泛地团结各党各派各界各阶层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抗战行动，壮大了人民的力量。

抗战初期中共力量在南方的大发展，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牢牢地把握时局，自觉地实行政治策略路线的总体转变，为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尔后中共审时度势驾驭时局，及时调整政治总路线，实现历史性转变首要的决定性的一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实行抗日救国十条方针。“八一”宣言的发表，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开端。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对国内外时

局的新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实行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根本性转变。为了彻底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确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党中央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明确提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并号召全党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瓦窑堡会议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也为党在南方国统区的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创造了根本条件。

在瓦窑堡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御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共于1936年12月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使之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2月,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国民党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我党建议并确定了对外维持领土主权对内进行和平统一的方针,至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

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由可能性初步变成现实性的情况,强调党的组织向全国发展,以适应新局面的需要。张闻天和刘少奇分别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号召全党努力实行彻底转变,以争取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战场。

1937年7月7日,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策,决定了党在敌后持久抗战的战略任务和作战方针,为迅速发展壮大党在全国范围的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自觉地制定并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策略路线的总体转变,一是党牢牢地把握了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二是党已经能够熟练自如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三是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四是党掌握着一支经过长征锤炼的坚强红军和一块巩固的陕北中央苏区。这四个条件,也正是抗战初期中共力量在全国在南方迅猛壮大起来的大前提。

二、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建党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为党的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为了使党的力量从西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全国,以完成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的政治策略路线所规定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组织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是“目前推动党的工作前进的主要关键”。

通过抗战爆发前后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党抛弃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急躁的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展开了批判斗争,尤其是坚决抵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强调发展党的力量、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出一条正确的组织

路线,概括起来即:坚持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党,使之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坚强的马列主义的并在抗战中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大党,在持久战中率领广大民众打败日本侵略者。从1937年下半年起,党充分利用两个政权对立状态消除后的大好时机,努力将地下党不“合法”的小范围的秘密活动转为大规模的公开活动,逐步制定出发展自身力量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

一是制定了有步骤地由逐步恢复发展到大发展的方针。抗战爆发前,除了陕甘宁边区主力红军以及南方零散的小块游击根据地中少量红军游击队和保存下来的党员外,党在全国的力量显得较薄弱。早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便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况与形势所赋予党的任务极不适应,提出必须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此后,中共中央一直牢牢抓住这一关键环节,反复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上海、太原失陷后,毛泽东指出“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党应该从苏区与红军转向全国,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必须“建立新组织,着重于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指出这是“党目前迫切与重要的任务”,同时又要杜绝“拉夫”式的征收党员。月底,直接领导南部中国地方党组织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东南分局也发出《给省委、各特委猛烈发展党的指示信》。这一系列指示下达后,南方13个省的地方党组织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壮大起来。这一历史过程具有明显的步骤性和阶段性。第一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党中央主要通过北方局派遣少数力量赴南方,建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负责粤、桂、云等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并向长江流域诸省派遣了一些干部。其特点主要是部分地恢复发展基层组织和清理旧关系,积蓄力量,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第二阶段从洛川会议到南京失守。党中央加快了在南方恢复和发展组织的步伐,先后派人与南方各游击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建立了河南、江苏、浙江3个省(临)委,湖北、湖南、四川3个省工委和皖中工委,将南方临时工委正式改为中共南方工委,等等。第三阶段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到武汉沦陷。这个阶段党的力量在南方迅速猛烈发展,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局到各省各地区的组织机构,包括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鄂、湘、浙、赣、闽、粤6个省委和皖、贵2个省工委,统一了云南党组织(建特委),整理改组了广西省工委等,并且广泛地建立健全了遍布南方各地的特委、县委以及基层支部,许多省区成数倍、数十倍地发展了党员。至此,党在华中、华南、华东、西南广大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实现了党的力量向南方扩展的战略目标。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干部政策。首先,中共中央特别强调了干部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在“伟大斗争的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要领导最广大民众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能成功”的。其次,党清除了过去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家长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残余,正确地制定了爱护、信任、使用、教育干部的政策。1937年初夏,党中央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干部的标准和作用,即这些人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主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

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抗战进行了15个月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将党的干部路线高度概括为“才德兼备”、“任人唯贤”8个大字。由于党实行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领导方式，并且注重把干部放在火热的斗争中去使用去锻炼，因此在南方工作的各级干部为恢复和发展党的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领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在抗战初期南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三是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在汹涌澎湃的抗战救国高潮中，涌现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成为抗战初期中共组织工作的主要政策之一。瓦窑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认真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倾向。此后，刘少奇强调指出应该向优秀的知识分子敞开党的大门。1938年3月中央决定，大胆地向着“城市中与乡村中的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南方各级党组织积极审慎地接纳一批批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取得了很大成绩。长江局专门成立了招生工作委员会，从武汉向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输送了数以千计的知识青年，经过培养锻炼，其中大部分人成为中共党员和抗战的中坚力量。

四是制定了积极慎重地清理、恢复旧关系的方针。清查和恢复旧关系是抗战初期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抗战前，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星散着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还有一部分党员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于这部分人的清查和恢复组织关系的工作，在1937年7月7日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后，又于同年底和1938年5月下旬，先后两次发出关于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问题的通知。刘晓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严格审查，恢复了上海原地下党组织成员的组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江苏省委。湖北省的组织工作也是由清查恢复旧关系入手的。1937年9月郭述申由延安派往武汉后，对原有党组织和个别党员进行了严格考察和筛选，为以后湖北省的组织发展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长江局专门发出了《关于恢复组织关系的通知》，对一般失掉关系的党员以及被捕后曾填写过保单的党员和叛变分子，分别做出了详细的处理规定。南方各省党组织严格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有关指示和政策，在清除了一批渣滓的同时，审慎地恢复了许多旧关系的党籍，调动了他们抗日和革命的积极性，挽救保存了这部分革命力量。

五是制定了教育党员的方针和措施。从瓦窑堡会议提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广大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始终贯穿着坚持发展与教育相结合的一条红线。它决定了抗战初期党员队伍具有良好素质。长江局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亲自授课或作报告，学员多为各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干部，学习内容包括抗战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湖北省委分别在武汉、鄂东七里坪举办党训班，湖南省委成立了党内教育委员会，浙江省党组织对未举行入党仪式的党员补行宣誓。长江局还抓

住张国焘叛逃这个反面典型，组织广大党员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告诫大家以此为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南方各级党组织通过狠抓党员教育工作，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 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在抗日救亡洪流中壮大党的力量。

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南京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大力开展南方国统区的工作，掀起了以武汉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一时出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大联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力量。

第一，通过大力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各种群众性团体，从中吸收经过严峻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抗战初期，党先后在南方各级党组织中建立起发动组织群众运动的各类工作机构，长江局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部长的民运工作部，各省区党组织普遍建立起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有的还设立了农委和文委。当时许多重要的救亡团体就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和工、青、妇委直接影响参与下成立的，为党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和后备力量。1937年底，在董必武直接指导下，经湖北省工委青委酝酿筹划，以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武汉民先队为基础，组建了日后发展成为南部中国最大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武汉青年救国团，党在该团体内设立党团，由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杨学诚任书记，总团部及其分团部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到次年7月，青年救国团已扩展到全省及邻近省份战区，建立起15个分团部，成员达5万余众。青年救国团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为党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团员中有相当一批人先后入党并担任领导工作。此外，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江西青年服务团、云南民先队、河南青年救亡协会等团体中，也产生了许多新党员。长江局工委积极领导各省开展工人运动，并在周恩来指示下，大力协助朱学范建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长江局妇委成员邓颖超参加建立的改组后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儿童保育会，培养锻炼了一批妇运骨干。各省党组织还以开办夜校、识字班，组织读书会、演讲会等形式，宣传组织民众，同时从中培养优秀分子入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平津流亡到南方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的共产党员们，对发展长江流域党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先队工作的决定》，指示“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的民先队员，应编入地方党内”，“如没有地方党时，即应负责建立地方党”。平津流亡的民先队中的党员，忠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协助各地方党恢复重建基层组织，发展一批又一批新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第二，充分利用国民党“官办”的抗日机构和团体，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日本侵略者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和中共及全国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松政策，并且在各地建立起一些“官办”的抗日机构和团

体。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一方面积极敦促赞助国民党当局的抗战行动，一方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派遣力量加入这些团体和机构，以发展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南方各省及其下辖区县的民众动员委员会，几乎都有一些共产党参加工作，在许多地方，党实际上控制了动委会的领导权。如安徽省工委派遣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该省动委会，掌握了组织部、宣传部等重要部门。据当时任安徽省总动委会宣传部主任干事（党内职务为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的张劲夫回忆，该动委会实际上是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的，下属工作团的许多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分别被派往各地，迅速在大别山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发展了党的组织，并通过地方党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后来各县动委会的300多名干部和各工作团的1700多名团员，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新四军。又如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由张天翼、吕振羽、田汉等发起组织，国民党省党部常委陈大庸担任理事长，共产党员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工人干部训练班，由中共派干部与国民党合办，湖北省委当年输送到延安的第一批80多名工人中，大部分人是从这个训练班挑选出来的，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

第三，通过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和国民参政会，积极组织民众运动和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的力量。1938年春，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该部第三厅厅长。为了加强党在第三厅的核心领导作用，周恩来直接领导该厅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包括郭沫若），并在其中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冯乃超任书记。第三厅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组成了强大的阵容，以致当时社会上盛称该厅为“名流内阁”，国民党则有人称之为“共产党的租界”。在第三厅的组织下，南方国统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再次沸腾起来，其中以4月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与“七七”抗战周年的献金狂潮最为震撼人心。在保卫大武汉的日子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中共湖北省委公开亮出旗帜，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著名共产党人经常公开活动，宣传全面抗战路线，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公开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许多爱国志士由此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亲自部署第三厅的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或大后方，各队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舞台是国民参政会。经过中共和各方面的斗争，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为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7人。虽然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中共还是“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工作。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中共参政员广泛地开展团结争取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共商国是，赢得了敬重与信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态势，实际上就是从抗战初期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广泛开展对国民党军界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创造有利于党的力量发展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毛泽东于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

务)的报告提纲中,科学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翼之分,其中“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人和地方实力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河南,周恩来、叶剑英于1938年春安排张友渔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部队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张后来推荐4名同情共产党的人担任了县长。中共还同国民党高级将领商震、张钫、于学忠、何基沔等保持过合作抗日的良好关系。周恩来在武汉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七七”抗战名将何基沔去延安参观,何随即赴延。河南省委抽调200多名干部,以七十七军名义组成“七七”工作团,在桐柏山区坚持抗日,后来信阳、西华、扶沟、襄县、永城5个县的县长都加入了共产党。长江局和河南省委派人同国民党十二军军长张轸建立统战关系后,张轸曾向新四军驻竹沟部队援助了大批枪枝弹药。在安徽,长江局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和该省知名人士朱蕴山、章乃器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开辟了皖西、鄂北、豫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在浙江,通过与省府主席黄绍宏的统战关系,许多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在各县政治工作队中担任领导骨干,地方党还协助黄制订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与广东第十二集团军的余汉谋,川军、滇军的刘湘、邓锡侯、龙云、陈离、张冲等将领建立了统战关系。龙云部184师师长张冲调往华中前线作战赴汉时,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叶剑英、罗炳辉,希望中共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师工作,党即从延安、武汉陆续派了一些党员去建立了中共支部。徐州会战时,长江局参谋处干部薛子正赴该师前任张冲秘书、后任参谋长,以后又任卢汉的随行参谋。这些统战工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川军、滇军的一些部队起义,打下了基础。中共还对一些国民党嫡系将领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如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开展对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工作,促使张治中采取了释放政治犯、欢迎流亡外地的共产党员回家乡进行抗日活动等进步措施,这无疑对中共力量在湖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四、根据战争状况,针对南方不同地区的不同任务,相应地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以壮大党的力量。

仔细考察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工作和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轮廓:即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里,正面战场的总体趋势为敌进我退,形成了敌后方、战区、我后方的不断演变着的战争格局,由于敌我力量、国共力量以及革命形势发展的三种不平衡,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实际上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环境,相应灵活地制定了不同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式,使党的组织及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迅猛而健康地壮大起来。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江苏大部沦陷,12月下旬南京会战后浙江等地成为敌后,1938年5月以前,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胶着于津浦线一带。因此,抗战初期敌后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位于华东一带,津浦线以西包括武汉在内的广大地区为临敌区或战区。我后方大体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根据这样的战争状况,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工作活动分别采取了如下方式。



在敌后,首先是日军占领的华东沿海中心城市上海,党采取荫蔽精干的退却方针,活动方式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埋头苦干,耐心地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建立坚固的战斗堡垒,待机而动。同时,努力开展外县工作,输送大批党员干部和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后,刘晓就奉命到江苏工作,毛泽东指示他,既要开展群众工作,又要注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1937年11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就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致电江苏省委,指示“转入秘密状态”,“工作方式应有必要的转变”。次年5月1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江苏省委,进一步指出“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引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江苏省委迅速派干部下乡,加强对已建立的游击武装的领导,逐步开辟了几个游击区,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南京沦陷后不久,周恩来在汉亲自领导建立了一支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这支游击武装的许多干部是共产党员,它迅速扩大到1000多人枪,1938年5月即跨过津浦线,深入敌后,严重威胁着南京和芜湖一带的日伪据点。徐州失守后,津浦线以东沦为敌后,长江局遵照中央指示,于1938年8月建立中共皖东特委,以准备发展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进行建党工作。

党在南方敌后发展自身力量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即将分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迅即开赴抗日前线,深入敌后,大规模地发动与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洛川会议确定了中共军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和作战方针。这是党的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变,它保证了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为了在南方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党做了艰苦的工作。经中共代表团反复努力,1937年10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2月军部在汉口挂牌办公。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新四军问题,决定迅速集中部队。次年1月军部迁南昌,月底颁布战斗序列。4月全军集结于大江南北。5月以后,四个支队分别在江南江北展开作战,一、二支队毅然深入南京附近的茅山一带,初步建立了苏南和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威逼京镇,敌胆为寒,不仅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南方抗战和发展南方党组织的坚强后盾。

在战区。抗战初期南方的战区,大体上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党在以上地区,第一个任务是大力发展党组织,第二个任务是动员组织民众参战,推动督促政府和军队抗战,第三个任务是根据各地战争状况,把将要失去的城市中的大批干部、党员、青年学生转移到乡村去,准备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正如前文所述,党在这些地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是胜利地圆满地完成了。关于第三个任务,这些地区的党组织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破坏,也出现了部分失误。

南京刚失守,中共中央即对南方战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有一个总体部署。1937年12月30日,中央两次致电长江局,建议国共军队共同建立苏浙皖赣边、鄂豫皖边两大军区和皖南、皖北等6个辅助军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另建苏鲁军区,并布置了陈

毅、高敬亭等中共武装力量的具体行动路线。这是包括南方正面战场和侧面战场的全面的战略部署，也是在江淮河汉地区准备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案。虽然蒋介石未全部采纳这些建议，但中共在南方的武装队伍大体上是照此行动的。接到中央指示后，长江局决定立即“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去发动与武装广大民众”。2月，河南省委提出了“发展十万抗日武装”、“全党军事化”的口号。长江局决定“周骏鸣部仍在鄂豫边力求发展”，准备在豫西南及鄂北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并设想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建立一个军区，由彭雪枫负责指挥。与此同时，战区一些省的党组织积极开展培养造就游击战争人才的工作。湖北省委先后开办了黄安七里坪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汤池等训练班。河南省委在竹沟开办教导队和各类训练班，共培养出军政骨干3000人左右，并先后5次向新四军输送各类人员2000多人。党还组建了一些游击武装。周恩来专门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注意发展皖中地方游击队。河南省委在豫东及苏鲁豫边建立了几支均拥有千余人枪的游击队，在敌人占领前，已将游击武装准备好，“这是过去华北没有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布置华中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召集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等到汉传达部署，朱马上沿平汉、陇海铁路动员了1万多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下乡。月底，省委决定“立刻再创立一千五百到二千人的新四军，作为领导（黄河与长江之间）全军区的游击队的骨干”，“加紧准备豫西山地游击战争”，“支持豫东平地游击战”。武汉沦陷前夕，彭雪枫率部奔赴豫东，与肖望东等部汇编成新四军游击挺进支队，渡过新黄河，开赴豫皖苏边敌后抗日作战。湖北省委于6月决定建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加强了外县独立工作力量。鄂东特委决定沿日军进攻路线准备开展游击战争，陶铸、杨学诚等也在鄂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武汉青年救国团、民先队等党领导下的团体，也分批派遣不少青年下乡，“预备武汉万一不保时，在山地展开游击战”。安徽省工委决定，把游击战争的重点部署在原鄂皖苏区的中心地带。徐州失守前后，南方战区其他省（如福建、广东、江西等）也分别根据各自情况做了一些游击武装的准备工作，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长江局没有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徐州失守后中央关于部署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没有及时地大规模地动员云集武汉的人员下乡，部分地贻误了大好时机。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大后方，由于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远离抗战前线，革命形势发展相对较缓慢，党的力量发展的阻力也较大。因此，从整体上来讲，党在南方的力量的布置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敌后和战区为主，以大后方为辅。党在大后方的任务和工作方式是，响应抗战动员，帮助政府征兵，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建立一些公开的救亡团体，多进行上层统战活动，同时建立党的秘密精干的堡垒。南方大后方的地方党根据中央指示，逐步审慎地恢复和发展了各级党组织，组织并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努力开展了对上层实力派和下层统战对象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使中共在大后方立稳了足根。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根据时局的演变而及时实行政治策略总路线的转变,逐步制定出一条保证政治路线实现的组织路线及其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并且在南方因地制宜灵活地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尽相同的工作方式,从而迅速地将壮大自己力量的工作推向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高潮。它为迎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为赢得抗日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在抗战初期所创造的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工作,不无深刻的有益的借鉴作用。